

鲁 迅

赵 晋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①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②③}

（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918年在南京由其堂叔祖改名为周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鲁迅是其笔名，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鲁迅原籍浙江绍兴，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是仕宦门第，早在嘉庆、道光年间，这个家族就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97、698页。

广置田产,设肆营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翰林出身,曾做过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在北京任内阁中书。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考中秀才后却不曾中举人,仕途不得意。鲁迅的母亲鲁瑞,所生子女 5 人,鲁迅居长,二弟周作人(槐寿),三弟周建人(松寿),其四弟和小妹均早夭折。

鲁迅幼年时,得到继祖母、父母、保姆的爱抚并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鲁迅的亲祖母在生下周伯宜后不久去世,继祖母蒋氏,态度和蔼,对鲁迅也很疼爱。她给鲁迅讲老虎跟猫学艺、水漫金山的故事等。听了那些故事,使童年鲁迅对虎和金山寺里的法海和尚十分仇视。父亲忧国忧民的思想与言论,母亲喜爱看戏的偏好,都使鲁迅受到感染。与童年鲁迅朝夕相处的保姆长妈妈,是一个善良、朴实、勤劳的农村妇女。她经常给鲁迅讲述娓娓动听的故事,对童年鲁迅百般爱护。鲁迅的第一个师父是长庆寺龙和尚。父亲为了使鲁迅平安长大成人,不到一岁时就抱他到庙里拜龙和尚为师。龙师父不为佛门清规戒律所束缚,为人随和可亲,鲁迅很喜欢接近他,也从他那里得到教益。

鲁迅 7 岁时入私塾,在新台门从其远房叔祖周玉田先生习读史书《鉴略》。后又到同在新台门里的周子京先生所办私塾求学。¹²岁时,鲁迅走出新台门,到绍兴城内著名的三味书屋求学。质朴而博学的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先生,颇有些爱国思想,对崇洋媚外者深恶痛绝。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他却墨守成规,完全遵循孔孟之道。在三味书屋,鲁迅熟读了孔孟的书,却对封建教育极为反感。他看了《二十四孝图》后,认为其中宣传的孝行不近人情。如“郭巨埋儿”的故事,说郭巨因为家贫,要把亲生儿子活埋,以便供养老母,只是因为儿子一再嫌坑浅,郭巨一次次深挖时,挖到一块金子,儿子才幸免一死。鲁迅后来描述他看完这个故事的心情时说:“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

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鲁迅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在三味书屋,一次对句课,老师出的上句是“独角兽”;学生们有的对“九头鸟”,有的对“八脚虫”,鲁迅独出心裁,对的是“比目鱼”。老师称赞他对得好。“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以“比”对“独”,珠联璧合。鲁迅的对句作业本上,老师画上了许多红圈,并经常称赞他才思敏捷,对句工整不俗。对学生们普遍感到负担沉重的背书作业,虽不见他下多大功夫,到时候却能熟练地背诵。在三味书屋,鲁迅还在从容应付老师所教功课之余,读了许多课外书,如《花镜》、《广群芳谱》等。

1893年,鲁迅的祖父因触犯清廷刑律而被捕入狱。鲁迅随其母避居乡下舅父家半年。他母亲是乡下人,幼年时他常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暂住。童年的鲁迅,在同乡下孩子们的嬉戏玩耍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逐渐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体察到他们勤劳质朴的性格,知道了他们毕生受着压迫,生活艰难痛苦。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少年鲁迅思想上埋下了同情劳苦大众的种子。在舅父家生活半年后,因祖父被捕而深怕受到株连的紧张空气已渐趋缓和,鲁迅又随母亲返回绍兴城内家中。她们回到新台门时,周伯宜患了水肿病,医治无效,于1896年去世。家境剧变,使鲁迅不得不辍学在家。本家叔祖周椒生,此时在南京水师学堂任职。决心“走异路”的鲁迅,毅然拜别慈母,离开家乡,到南京投奔周椒生,谋求新的生活出路。

(二)

1898年5月24日,鲁迅考取江南水师学堂试习生,三个月后

正式补入管轮班。1899 年 2 月,鲁迅转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里,鲁迅学习了《地学浅说》、《水学入门》、《几何》、《开方》等课程。求学期间,他热心研读西欧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译著,开始注意国内时事政治问题。他最喜欢读的是维新派人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这本书中所宣扬的生物进化、生存竞争思想,使鲁迅感受到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思想领域。根据这本书中所昭示的物竞天择原理,鲁迅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必须接受世界上的新鲜事物,革除陈腐陋习,才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鲁迅眼界大开,逐渐疏远了遗老遗少们所抱定的旧思想,站到了主张励新图治的人们一边。屈原的作品、范缜的《神灭论》等千古不朽之作,对鲁迅的革命思想和唯物史观的确立给以很大影响。与此同时,鲁迅在学业上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全班只有他一人得到最优秀学生的金质奖章。

中国的变法维新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获得了成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决心踏出国门,飘洋过海,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于 1902 年 1 月底,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往日本留学。

1902 年 4 月,鲁迅到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矿务,两年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4 年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1906 年又决定弃医从文,他留学日本共达七年之久。到日本后不久,鲁迅毅然剪掉“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辫子”,表达了他坚决反抗清政府统治的鲜明态度。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旅居日本的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章太炎、邹容、秋瑾、陶成章等先后到达日本。他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鲁迅积极参加了革命党的各种活动。他认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党之骁将”。1903 年,鲁迅在一张

断发后所照的相片背面写下了一首《自题小像》七言绝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 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抒发了鲁迅爱国主义的情怀，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忧虑。“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他毕生信守的誓言。

1904 年 9 月，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攻医学。他改攻医学，自认为是出于对被庸医所误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情，而且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日本的振兴是从学习西方医学开始的。出于忧国忧民的动机，鲁迅一度认为从医是可以救国救民的。

在仙台医专，鲁迅遇到了他终生敬佩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藤野教授学过汉文，尊敬中国，对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也能高看一眼。因此，他对鲁迅非常关心，尽心尽力予以指导帮助。鲁迅听他的课所记的笔记，他都要拿回去修改补充，文法上的错误也都一一加以订正。藤野先生添改过的讲义，鲁迅钉成了厚厚的三大本子。藤野先生关心着中国学生的学业，也关心着他们的饮食起居以及会话等。对鲁迅这样的得意门生，他更是倍加关照。在成为藤野先生的学生之后，鲁迅真正领受到了异地的温暖。藤野教授治学的严谨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使鲁迅得到莫大的激励与鞭策。藤野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给予鲁迅终生不忘的深刻影响，并成为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事例。为了时常以藤野先生的精神激励自己，藤野的照片高高悬挂在鲁迅书桌对面的墙上，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的一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就是在他感到疲倦时抬头看见藤野先生的照片之后又继续写出来的。

“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 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的现实，使鲁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不在于躯体而在于精神，手术刀不可能挽救中国人的灵魂，医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改

革，并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更要紧的，是改变人的精神。他对好友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鲁迅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决定弃医从文，把自己的战斗岗位从自然科学转移到文艺和社会科学战线上。1906年3月，鲁迅依依不舍地拜辞藤野先生，离开仙台，回到东京。不久，鲁迅回国，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婚后不几日，便又返回日本。

早在1903年，鲁迅还在学习矿业时，就已开始了大量的译著工作。他经常为浙江留学生刊物《浙江潮》撰稿，曾连续发表过《哀尘》、《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著译作品。他还写了《中国地质略论》，并与友人合编了《中国矿产志》。弃医从文后，他得以专注于文化事业，著述日渐增多。他在河南留学生刊物《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的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这一系列论文，从进化论观点出发，反对顽固保守，充分表现了鲁迅早年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进化论和反对封建主义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尊个性”思想，时常左右着鲁迅的言论和行动，直至他成为共产主义者。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的一些译著编为《域外小说集》，分两册出版。

鲁迅在日本的七年间，积极参加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07年后，在孙中山领导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烈火已在中国土地上燃烧起来。1909年6月，鲁迅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回国后，鲁迅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年。1910年8月，应蔡元培之邀，他回到故乡绍兴，到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一个月后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绍兴城内为杭州的光复召开庆祝大会，公推鲁迅任主席。1912年

2月，鲁迅应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离开绍兴到南京政府教育部工作。不久，袁世凯窃国，强迫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迁。

（三）

1912年5月5日下午，鲁迅到达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十天后，他正式开始到设在前清学部衙门里的教育部上班。第一天上班，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教育部留用了前清学部的大批人员。次长范源濂就是在前清学部任过参事官的旧官僚。旧官僚们极力排挤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新派，不久就把他挤下台。对南方来的部员，他们也一概视为革命新党。同在遭受排斥打击之列。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科长。鲁迅任职教育部，本来希望能为革新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贡献力量，但是，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和教育部的腐败现实，使他感到处处掣肘。1915年，袁世凯加紧恢复帝制，12月12日正式登基称帝。83天后，在全国一派反抗怒潮中，袁世凯帝制破产。1917年7月，张勋演出复辟丑剧。在一片混乱之中，教育部总长、次长换来换去，部员无所事事。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尽量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同许寿裳等几位旧友一起，亲自动手制订注音字母。他们以章太炎早年拟就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用构造最简单的古字制订了39个字母，并获得有关部门通过。鲁迅十分关心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并不止一次地把自己买到的文物，如瓦当、大镜等，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他还直接管理京师图书馆的改组、迁移、扩建工作，从选择馆址到计划预算，一应杂物均亲自过问。他的辛勤劳动，为日后藏书丰富的北京图书馆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帮助建立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并参加了儿童艺术等展览会

的筹备工作。

1916年5月6日,鲁迅搬入绍兴会馆中靠西面的补树书屋居住。这里原有一棵大楝树,楝树倒后补种槐树,故称‘补树’书屋。传说槐树上曾吊死过一女人,长期无人居住,鲁迅为图安静搬到这里。在这里,为排解无聊和寂寞,他读佛经,抄古籍、碑帖,直到夜半更深。通过研究佛经,他深化了对中国封建社会和人民精神生活的认识。通过研究,他明确指出:“佛经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都不会复活了。”^① 1917年7月‘辫帅’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鲁迅愤然以辞职表示抗议。复辟失败后,他才重新回教育部工作。后来,他曾描述过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 在漫漫长夜之中,面对黑暗势力,鲁迅在解剖自己。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鲁迅胸中希望的火花。1918年初,鲁迅开始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在编辑部开会时,他认识了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结识之初,他对李大钊就颇有好感,后来他曾说:“不知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有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③ 对《新青年》的其他同人,他自称佩服陈独秀、胡适之,却亲近刘半农。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借助一个迫害狂患者之口,采用双关的语言和象征、比喻等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它剥开了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② 《《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

③ 《《守常全集》题记》,见《南腔北调集》。

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伪装，尖锐地指出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他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不仅用来推进白话文运动，更重要的是用以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狂人日记》反映了社会的弊病和悲剧，起到了在文化思想界震聋发聩的作用，通过它的传播，使“礼教吃人”成了进步人士和广大青年的共识。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等小说，并发表了许多论文、杂感和白话诗。封建礼教吃人，封建文化吃人，封建社会吃人，是鲁迅这一时期大量作品的主题。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卖国政策。此后，五四爱国运动迅猛发展，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蔓延。鲁迅对五四爱国运动十分关心。他向参加集会和示威的爱国学生详细询问天安门大会的情况和游行示威时大街上的情况。“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一九一九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到他那里走动的青年大抵是他旧日的学生。他并不只是关怀某些个别青年学生的一举一动，他所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是全体进步青年、大部分是他所不认识的、也是大部分不认识他的那些进步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①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这是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专号以李大钊的长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主，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革

^① 孙伏园：《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见《中国青年》1953年第9期。

命青年中发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期《新青年》上，鲁迅发表了小说《药》和 4 篇《随感录》。他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严厉驳斥了中外反动派攻击“过激主义”的谬论，表明了他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鲁迅在进行白话小说创作的同时，为了破除“诗坛寂寞”；也打打边鼓，发表了一些新诗。他的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新诗创作，同样在革命青年中发生了重大影响。在鲁迅等人的感召和努力工作之下，一支新的文学队伍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支队伍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壮大。新文学队伍的发展壮大使文坛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报刊在逐渐增多。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所办的《新潮》，为小说作者开辟了新的园地。鲁迅积极支持新潮社，希望他们在刊登小说的同时，讲科学，发议论，鞭笞守旧派。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热情歌颂了城市劳动人民。这篇作品通过“我”乘人力车时所遇到的意外事故用对比手法描写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不同思想和行为，衬托了车夫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表明鲁迅对劳动人民所寄托的希望。从 1920 年起，农民问题成为鲁迅观察社会问题时注意的中心。1920 年 8 月，鲁迅写了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风波》。小说描写了辛亥革命后一个名叫七斤的男子进城被剪了辫子。除此以外，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任何意义的变革。待到张勋复辟“皇帝坐了龙廷”的消息传来后，七斤及其家人因七斤头上没有了辫子而惶惶不可终日。与七斤不同，赵七爷在辛亥革命后把辫子盘在头上，张勋复辟后又放了下来，并向七斤兴师问罪。一根辫子的风波，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了顽固的复辟倒退思想，也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教育广大农民的必要性。

1919 年 8 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所房子，修缮后于 11 月迁居这里。12 月，他回到故乡绍兴，接来母亲和家人

在此居住。这次返乡的生活体验,使他获得了小说《故乡》的创作灵感。原本生机焕发的少年闰土,在农村生活的若干年后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辛苦、麻木的深受生活所累的农民。鲁迅通过闰土前后判若两人的显著变化,为的是提起人们注意,要去设法改变中国农民的生活道路。农村需要变革,农民需要变革。

《故乡》发表于1921年5月,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鲁迅虽然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思想品质,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坚强而光荣的一员——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一员。

1921年冬,鲁迅开始撰写著名小说《阿Q正传》并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这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毒害的未庄农民阿Q的形象。阿Q无家无业,无亲无故,靠打短工度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一无所有,甚至失去姓氏和籍贯。连他说一句姓赵,也要挨赵太爷一个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他“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①。赵太爷、地保等联合起来,对阿Q这样的贫苦农民施行压迫与剥削。阿Q经常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他既自高自大,又自轻自贱。他与别人发生口角时,声称“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当别人抓住他的辫子把他的头往墙上撞,还要他说“人打畜生”时,他只好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要跟吴妈“睡觉”,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打跑,不一会却又忘得一干二净,又来到赵太爷的内院。他惹不起别人的打骂和凌辱,却转而去欺负小尼姑。

^①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见《且介亭杂文》。

在封建意识的氛围中,阿 Q 也时常流露出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妨”等封建礼教格言。辛亥革命爆发后,阿 Q 先是不理解。当他看到城里的举人老爷因为害怕革命而搬到乡下,于是他对革命便未免有些“神往”了。革命后,赵太爷竟怯怯地叫他“老 Q”,赵白眼也惴惴地称他“阿 Q 哥”,使他感到新鲜而快意。生活实践教会阿 Q 在朦胧中认识革命并投奔革命。这也反映了鲁迅对于农民的革命要求的探索与认识。革命后,一切依旧,“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未庄仍是赵太爷的天下。只有阿 Q 被诬为盗贼,枪杀了事。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以及由此而发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引导人们认识中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无力承担领导责任。

鲁迅这个时期的十几篇小说,由他自己编辑成册,名为《呐喊》,于 1923 年 9 月出版。鲁迅的“呐喊”,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使一大批革命青年从中受到了教育。《呐喊》中的作品,尤其是《阿 Q 正传》,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传播并获好评。

五四时期,鲁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写了许多杂文,既有篇幅较长的论文,也有短小精悍的随感录。鲁迅的杂文常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为了引起社会人士对《新青年》的广泛注意,1918 年 3 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收集了顽固派攻击文学革命的种种论调,写了一封信在《新青年》上发表;又由刘半农写了复王敬轩的信,痛快淋漓地对顽固派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批驳。这样,通过激起论争的方式破除了寂寞,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当胡适对此表示大为不满时,鲁迅态度鲜明地支持了钱玄同和刘半农,并坚决拒绝了胡适提出的由他自己单独编辑《新青年》的主张。

为了回击顽固派掀起的复古思潮,鲁迅针对顽固派大力鼓吹

的‘表彰节烈’口号,于 1918 年 8 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一文,猛烈抨击腐朽的封建节烈思想。他指出,顽固派所宣扬的女子不节烈便“国将不国”一类说教的实质,不过是为了把女人当作私有物或牺牲品,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男权主义的特权。此特权是在封建统治者濒临末日的时候,“皇帝要臣子尽忠,男子便愈要女人守节”。鲁迅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述,全面否定了封建的节烈观,号召人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得到正当的幸福。

代表最腐朽的封建势力的“国粹派”人物林琴南,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多次赤膊上阵,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顽固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思潮、新文化。林琴南的谬论遭到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痛斥与批驳。鲁迅在他的《随感录》中,也对林琴南等顽固派在‘保存国粹’名义下维护旧礼教、崇尚文言文、反对一切改革和进步的种种谬论进行了反复驳斥。对所谓“国粹”,他形象地比喻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鲁迅痛斥那些主张“从来如此,便是宝贝”的人,同仰慕往古、反对改革的‘国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批判旧礼教,反对‘国粹派’的斗争中,还十分关心下一代的问题。1919 年 11 月,他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论文,批判了历史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父权思想,主张破旧立新,父母应该对下一代负责,号召‘各各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还把确立新的父子关系与改良社会联系在一起。在鲁迅看来,封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统统要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五四时期,鲁迅在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方面,也成为一员闯将。宣传鬼神和迷信,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

^①鲁迅：《随感录》三十五，见《热风》。

民的重要手段。鲁迅在《随感录》中,不断揭露以鬼神愚弄广大人民的迷信思想与习俗,指出只有科学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五四时期,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之流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对此,李大钊等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同李大钊站在同一战线上的鲁迅,也在《随感录》中歌颂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尚缺乏深入了解的鲁迅,在听到顽固派‘过激主义来了’的叫嚣后,便站出来予以反击,指出顽固派的目的是想抗拒革命的潮流,以保障他们“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使人民永远处于‘刀与火’之下。热情讴歌有主义的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热切盼望新世纪的曙光,盼望祖国的新生,这就是鲁迅对待‘主义’的鲜明态度,也是他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鲜明界限。鲁迅热情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0年4月,上海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文中译本,译者寄赠鲁迅一册。鲁迅收阅之后,极力称赞这项工作做得好,并认为这是当时最要紧的工作。鲁迅为了维护《新青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坚决反对胡适提出的《新青年》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即使《新青年》编辑同人因此而分裂亦索性由之。

1922年1月,上海出版了《学衡》杂志。以《学衡》为阵地的一些文人墨客,也在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复古主义。他们声称文言优于白话,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学衡’派刚露头,其反动立场一目了然。因此,他们立即遭到鲁迅的迎头痛击。鲁迅写了《估〈学衡〉》一文,指出‘学衡’派们所写的文言文文理不通,揭露他们思想空虚,不学无术。‘假古董’经不住鲁迅这一击,难于再欺世盗名了。

1925年,鲁迅将其已发表的《随感录》和一些其他文章汇集成册。取名《热风》,成为他的第一个杂文集。鲁迅在这些著述中,表

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对新生事物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由相信进化论发展而来的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自觉适应时代要求、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政治态度。他在《随感录》中表示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指出：“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时变异，不相袭，一味因循守旧，势必成为退化的病根。他用进化论抨击顽固派、守旧派、国粹派，揭露封建礼教、封建文化是吃人之道、复古之道。在《生命的路》一文中，他指出：“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就是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鲁迅汲取其发展的观点，并从中引出新陈代谢、新旧斗争的思想，在行动中则是义无反顾地站在新事物一边，针锋相对地反对旧事物的卫道士。对于风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鲁迅持坚决反对态度。他反对弱肉强食，反对倚强凌弱。小至封建夫权、父权思想，大至民族压迫，他一概横眉冷对，毫不留情。

（四）

1920年8月，鲁迅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兼任任教，此后，又曾兼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教学工作。当时，他仍继续任职教育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在教授学生，培养新青年的同时，他开始了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工作，承担了中国小说史的教授任务。在封建社会，小说一向为士大夫们所鄙视，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是对传统封建观念的英勇挑战。鲁迅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位拓荒者。由于自古以来前人从未对中国小说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与整理，工作量艰巨浩繁。鲁迅花费了巨大精力，对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小说

进行了辑录、校订与研究。在认真系统地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将许多富于创见的研究成果和精辟论述传授给他的学生,不仅给学生们以有益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而且也以后研究中国小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讲课中,鲁迅治学严谨,思维敏锐,加之丰富的史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磁石般地吸引着每个学生。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座位上挤不下,就站着听讲。他的学生尚铨曾回忆鲁迅先生讲课时的情景:“如果不是许多铅笔在纸上记录时发出一种似乎千百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就让站在门外静听的人也要疑心教室里边只有先生一人在讲演吧?这显然是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得忘了自己了。”

1920年,鲁迅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京大学出版。后经修改补充,改称《中国小说史略》,由新潮社于1923年、1924年分上下两册出版。1925年7月,增加两篇,合成一册再行出版。以后又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再行修订,于1930年11月最后定稿出版。十年岁月,三易其稿,凝聚了鲁迅颇多心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编写过程中,既有许多独到见解,又能博采众家之长,使这部著作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在五四高潮时期已显露分化端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分化更趋明显。有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开始了致力于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生涯;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的右翼则公开站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干起了反对共产党和与工农群众相对立的勾当;也有一些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一显身手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形势下瞻前顾后,犹豫动摇,终于销声匿迹。慧眼识人的鲁迅,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伍,继续进行探索和战斗。经过分化组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闯荡出来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

建的文学战线上聚集起来，形成新的文学团体，坚持战斗。这些文学团体中，影响较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是由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进步作家和翻译家成为其会员。文学研究会主办了《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刊物。以沈雁冰为代表的一些会员，提倡‘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艺，曾以积极明朗的态度，向复古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倾向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创造社成员有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郁达夫等，都是日本留学生。创造社于1922年创办《创造季刊》，以后又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日》等。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①创造社崇尚创作，主张浪漫主义，曾被看作与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积极活动下，国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观同时被介绍到中国来。

鲁迅没有参加社会团体，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与社团发生关系。但是，鲁迅却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保持着联系。鲁迅的创作和理论主张，倾向于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与文学研究会抱定的宗旨基本一致。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工作，积极支持它的活动。鲁迅的许多著译作品，常由文学研究会发表。在共同的战斗中，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会员保持着相濡以沫的关系。鲁迅与创造社，政治目标相同而文学观点有异。他们虽然“曾用笔墨想讪，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②

与鲁迅关系很深的刊物，当数《语丝》。1924年，鲁迅的学生孙

①郭沫若：《编辑余谈》，见《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②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见《且介亭杂文末编》。